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1949—2009)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郭齐勇 ● 主编
问永宁 ●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1949—2009)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郭齐勇 ● 主编

问永宁 ●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 / 郭齐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ISBN 978-7-5004-9903-9

I. 当… II. ①郭…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9554 号

特约编辑 李登贵 等

责任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8740(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430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伟光

副主任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国刚	王 巍	尹韵公	厉 声	张宇燕
张顺洪	李汉林	李 平	李 周	李向阳	李 林
李 薇	李培林	步 平	吴恩远	陈众议	陈泽宪
陆建德	房 宁	金 碚	杨 光	卓新平	周 弘
郝时远	郑秉文	赵剑英	晋保平	曹广顺	黄 平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裴长洪	蔡 昉	潘家华

总策划 赵剑英

统 筹 曹宏举 王 浩 任 明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变动之中，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这一切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前面对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素材。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这一号召，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旨在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实施创新工程的目的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成果，多出政治方向正确、学术导向明确、科研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为人民服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实施创新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规律，完善学科建设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结构合理、优势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学科布局。作为创新工程精品成果的展示平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报告的撰写，对于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发展状况、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创新来说，是一项兼具基础性和长远性的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成就显著、举世瞩目。为了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观念、方法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我们亟待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不断总结各学科积累的优秀成果，包括重大学术观点的提出及影响、重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演变、重要学术著作与文献的撰著与出版、重要学术代表人物的涌现与成长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连续出版丛书，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分为两个子系列：《年度综述》和《前沿报告》。《年度综述》按一级学科分类，每年度发布，《前沿报告》每三年发布，并都编撰成书陆续出版。学科《年度综述》内容包括本年度国内外学科发展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热点问题，代表性学者及代表作；学科《前沿报告》内容包括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重大理论创新与热点问题，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每部学科发展报告都应当是反映当代重要学科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脉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性成果；都应当是作者长期以来对学科跟踪研究的辛勤结晶；都应当反映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该出版工程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系列丛书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史料文献和教学材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王伟光

目 录

导论:中国哲学研究 60 年的回顾与反思	(1)
第一节 两大阶段五小阶段	(2)
第二节 后 30 年转暖或兴起的八大领域	(7)
第三节 研究范式的转移	(12)
第四节 问题与前景	(15)
 第一章 中西融合与 20 世纪前期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	(19)
第一节 王国维、梁启超与中国哲学史学科	(20)
第二节 英美哲学影响下的胡适—冯友兰范式	(2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郭沫若—侯外庐范式	(36)
 第二章 中国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1949—1978)	(4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方法论问题 ..	(43)
第二节 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与相关论战	(51)
第三节 中国哲学研究之初步的学术成就	(59)
 第三章 中国哲学研究的转型(1978—2009)	(67)
第一节 思想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	(67)
第二节 通史研究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77)
第三节 中国哲学主体性与范式重构	(88)
 第四章 先秦哲学研究	(97)
第一节 儒家	(97)
第二节 道家	(110)

第三节	墨家	(120)
第四节	名家、法家与兵家	(127)
第五章	秦汉隋唐哲学研究	(133)
第一节	秦与汉代哲学思想	(133)
第二节	魏晋玄学思潮	(141)
第三节	佛教典籍的整理与中国佛教史	(148)
第四节	佛教各大宗派	(158)
第五节	道教典籍的整理与中国道教史	(166)
第六节	道教各大宗派	(174)
第七节	隋唐儒学与经学	(180)
第六章	宋明理学研究	(186)
第一节	程朱理学	(186)
第二节	陆王心学	(192)
第三节	气学传统及早期启蒙思潮	(201)
第七章	近现代哲学研究	(214)
第一节	近代哲学	(21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220)
第三节	现代新儒学	(226)
第四节	自由主义思潮	(236)
第八章	经与经学研究	(241)
第一节	作为中国文化之根柢的经与经学	(244)
第二节	50年代后的《周易》经传研究	(251)
第三节	近年来《诗》、《书》二经之研究概观	(259)
第九章	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268)
第一节	“少数民族哲学”的提出和论争	(268)
第二节	专题研究	(275)
第三节	各民族哲学通史与专著	(281)

第四节 趋势	(287)
第十章 古代自然与科技哲学研究	(289)
第一节 古代自然哲学及其特点	(289)
第二节 古代科技中的哲学思想	(297)
第三节 古代哲学与科技的关系	(304)
第四节 古代自然与科技哲学研究的方法与问题	(311)
第十一章 古代逻辑学与知识论研究	(315)
第一节 中国逻辑史研究	(315)
第二节 中国逻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324)
第三节 古代知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果	(330)
第四节 中国逻辑学和古代知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	(339)
第十二章 古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	(342)
第一节 古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342)
第二节 近年来古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专著	(347)
第三节 近年来古代政治哲学的专题研究	(354)
第四节 古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与展望	(362)
第五节 古代社会、宗教、伦理与礼乐文明	(364)
第十三章 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368)
第一节 六十年来的有关出土简帛	(368)
第二节 出土简帛与经子之学研究	(375)
后记	(402)

导论:中国哲学研究 60 年的回顾与反思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哲学”作出界说。按学科分类,过去称作“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现称为“中国哲学”。但使用“中国哲学”一词,又容易误会为指我国整个的哲学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本书所指“中国哲学”一般相当于今天所谓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即过去的“中国哲学史”。但又不尽然。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仅仅以知性的态度解析“中国哲学”是不够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蕴含着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的、总体的或分别的“道”与“理”等,此即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的层面,是活着的、流转的,在今天的世界与中国国民的社群人生中仍然起着安身立命的积极作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的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可以断代或分门别类或个案地作学术性的研究,并与外国哲学作比较研究的知识层面的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当然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又有着一些差别。

其次,我们强调三个 30 年的观念。讨论近 60 年来学术史的发展,不能不上溯此前的 30 年或 40 年。如果把百多年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我国人文学或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建构的历史来看,更能说明当代学术史的全貌。当然,我们讨论问题总有重点,现在研究的重点是 1949 年 10 月以来的 60 年,只是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把这一甲子之前的 30 多年,即民国初年至 1949 年的学术史作为背景或前史。讨论 60 年来我国大陆地区学术的发展,重点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年。但是,这一甲子的前 30 年,即 1949 年至 1978 年的学术史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后 30 年中的诸多问题之所以能引起深入讨论,真正具有学术性,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部分问题意识

则是缘自对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的反思。前30年的成果并不都是一无是处的。

自近代以来,学术分工的细化使得学科意识不断加强,各学科开始不断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方法等得到了极为深入的探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学术史^①、中国思想史之间的差别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和讨论。一般而言,哲学史研究以哲学形上学、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哲学问题与方法的探讨为中心,侧重分析各哲学系统的内在逻辑及其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哲学理论的演进、发展;而思想史研究则更重视思想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因素之间的互动,即特定历史情境对某一思想观念之形成的影响及思想观念反过来如何作用于社会现实,也即所谓“思想变迁的历史意义”。^②但必须注意的是,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常常是相互交叉的。虽然梁启超、蔡尚思以及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已进行过专门的讨论,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基于此,以“中国哲学思想史”作为讨论的主题,似更能全面地反映近6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受现代解释学等思想的影响,不少学者在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自主性的同时,也强调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及其与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紧密关联,因而主张以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相关研究。^③当然,本书作者均为哲学从业者,更为关注的是哲学内容及其研究。哲学内容更能反映时代精神,哲学智慧更能体现民族特性。

第一节 两大阶段五小阶段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本学科的先驱有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谢无量等。本学科的奠基人是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

^① 中国学术史一般研究的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流派,与中国思想史难分难解。近期有关中国学术史的多卷本著作有:张岂之主编、刘学智副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尹继佐、周山主编:《中国学术思潮史》(八卷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黄俊杰:《史学方法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增订三版,第245页。

^③ 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序言。

等，特别是受英美影响的胡适、冯友兰等。本学科的参与者还有钟泰等人。30 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冯友兰在抗战末期的《新原道》等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且较之前更有发展、更中国化了。从 20 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汤用彤、张岱年等人的创制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写就的颇有创造性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系列著作是又一典型。这成为 1949 年后的前 30 年本学科的主要依据或基础。简言之，1949 年前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胡—冯、郭—侯两种范式，此后 30 年主要流行的是郭—侯范式。

改革开放之前 30 年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49 年至 1966 年是所谓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学界典型的事件有 1957 年 1 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等，这次讨论会受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确立了哲学上唯物与唯心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两个对立”的理念，明显反映出教条主义对中外哲学史研究的干扰和打压。60 年代初期前后，有关孔子、庄子、王夫之哲学的讨论，是学术回暖的表现。1966 年至 1977 年为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评法批儒”，表明在政治强力笼罩下的学界进一步是非淆乱，极左的氛围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就出版的相关著作来看，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和邱汉生等人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至 60 年代初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无疑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人民出版社于 2008 年再次改版重印。这部《中国思想通史》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精神，对中国思想史的内涵、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① 本书确立了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基本范式。这部以思想史命名的著作有着很浓的哲学史的味道，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缩写本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纲》的上册，就曾以《中国哲学简史》为书名于 1963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时期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范式，如 1963 年出版的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等。此外

^① 张岂之：《〈中国思想通史〉简介》，《华夏文化》2008 年第 3 期。

还值得注意的是1952在海外出版的钱穆《中国思想史》，该书的特色在于注重由中西思想之不同论中国古代思想，力图“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①作者限于对哲学之狭隘的西方化的理解，认为中国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因而不是以《中国哲学史》而是以《中国思想史》来命名。但就内容而言，这部中国思想史更近于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前三册于1963年至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出版了全四册本。这一套书虽然带有时代烙印，但是作为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简单清晰的线索和逻辑系统而完整建构的中国哲学通史，无疑有重大意义和价值；而且该书作为教材，广泛运用于改革开放后的大学课堂，具有较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环境恶化，“评法批儒”、“批林批孔”，学术研究政治化，缺乏最基本的客观独立性，哲学史、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政治思想史。

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1981年杭州宋明理学讨论会等，都是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小的阶段（即整个60年的第三至第五阶段），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三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本学科研究进入复苏期。第一，以思想解放为背景，本时段中国哲学史界的主要倾向是摆脱受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阵”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张岱年先生以问题史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大纲》虽在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以宇同名义印行，但只是在这一阶段才开始起作用的。第二，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

^① 钱穆：《中国思想史·序言》，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高潮中，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潮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叙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以上两个脉络是并行且交叉的。前一脉络以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及“智慧说”三部曲与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上卷）、1983 年版（下卷））及萧先生的论著为代表。后一脉络以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之三部曲及汤一介、庞朴先生的论著为代表。

这期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侯外庐等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哲学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论著有何兆武等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以及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蒙文通、张岱年、王明、朱谦之、严北溟、范寿康、冯契、任继愈、石峻、杨向奎等先生等老当益壮，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阐扬、儒释道的创造转化及培养人才方面堪称楷模。第二代学者朱伯崑、萧萐父、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锦全、张立文、张岂之、卿希泰、余敦康、牟钟鉴、杜继文、杨曾文、方立天、方克立、刘文英、潘富恩、蒙培元、陈俊民、葛荣晋、张锡勤、崔大华先生等在各自领域中各有开拓与建树，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当然，我们所讨论的阶段不是死板的、机械的。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至魏晋四卷的初版为 1983 年至 1994 年，跨我们所谓第一、第二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的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是其中值得重视的方面，进展很大。有关情况，张海燕先生有较系统、全面的介绍。^①

第四阶段约为 1991 年至 2000 年，相对于前一阶段以拨乱反正为主而言，这一阶段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

① 详见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 期。

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杨国荣等崭露头角，创获尤多。陈、杨等著述颇丰，他们对从先秦到现代的整个中国哲学都有精到的研究，特别是他们有较强的西方哲学的背景与训练。也有学者对思想史研究为哲学史研究所主导的状况开始感到不满，力图摆脱“大号哲学史”的中国思想史写作方式，受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开始转而强调所谓“一般的思想史”，论著方面无疑以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

第五阶段约为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是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这一阶段仍在继续着。较前几个阶段，此一阶段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中外学术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个案与精专研究成果丰硕，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涌现出生机勃勃的第四代学者。

这一阶段较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更为殊胜之处在于，中国哲学学科的机构与制度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不少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学科点或研究所，包含涉及三级学科如易学、佛教与道教等中心或研究所）设置、建构起来并在继承中创新，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例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黑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相关机构已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镇。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5个中国哲学的国家级重点学科、20多个中国哲学学科的博士点，集聚和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相关民间社团及各地区的社团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就具体的学术活动而言，这一时期，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儒佛道藏等经典的资料性的整理工作深入展开，各断代、

各流派相当多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资料长编或年谱、学案等陆续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哲学间、各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做到了中外互动、古今会通。不少学者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扎实，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研究前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地分析、论证，十分可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各个时段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代表性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陈荣捷、劳思光、余英时、傅伟勋、陈鼓应、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的学术成果，在本学科都有较大影响。

自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陆地区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古人以 30 年为一世，中国哲学界的同仁在这一世中取得的成就已经到了可以总结和需要总结的时候了。为此，张立文、陈来、杨国荣、郭齐勇等先生已着先鞭，以近 30 年为中心，旁及前后左右，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心态、资源、制度、趋向、成就与不足等方面作了小结与反省。^①

第二节 后 30 年转暖或兴起的八大领域

后 30 年的各个时段，对哲学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相比较而言，传统哲学与当代的关系、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阈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

第一，传统哲学与当代

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系统，如信念信

① 详见郭齐勇《近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三大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略谈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趋向》，《光明日报》2007 年 8 月 14 日理论版；陈来：《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张立文、段海宝：《中国哲学三十年来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3 期；杨国荣：《中国哲学 30 年（1978—2008）的反思》，《中国哲学年鉴》（2008），哲学研究杂志社；秦平、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 30 年的反思》，《哲学研究》2008 年第 9 期；郭齐勇、廖晓伟：《六十年来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思考》，《文史知识》2009 年第 9 期。

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其中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起来且可大可久的根据。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史的上层、下层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在今天都有其价值与意义。

三十年来，大多数研究者们逐渐扬弃了清末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大陆地区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妄自菲薄、视自家文化如粪土、把传统与现代绝然对立起来的看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客观理解与评价，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发掘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并阐发、调动这些内在价值，使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健康、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十分注意挖掘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哲学做创造性的转化。

第二，经与经学的研究

五经或十三经研究的复兴，是近30年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事件。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与经学当然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经典之最重要的内容。

《书经》、《诗经》、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周易》、《春秋》经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四书》等经典中包含了中国哲学本体论与形上学，中国古代宗教、哲学、道德、社会、伦理、政治、历史的最根本的理念与架构，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与源头活水。近30年来，《易》学、《礼》学、《四书》学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专家、专著（尤其是博士论文）、研究机构或刊物（辑刊）。对有的单经的细节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准备（尤其是人才准备）阶段，但经与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指日可待。

第三，佛教研究

随着海内外哲学、宗教学界交往的日益频繁，30年来的大陆地区佛教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在佛教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由任继愈先生担任负责人的卷帙浩繁的《中华大藏经》（正编）已经出版，续编正在加紧编纂中。佛教史研究成就斐然，有关中国佛教及其重要流派（如唯识、天台、华严、禅、三论、净土等）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与有关佛教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之专著、专论层出不穷，学者们注意了包括敦煌卷子与日本等地新